

对维多利亚人如何“使用”奥斯丁的思考

——评《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

傅燕晖

内容提要 在《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中，美国学者谢丽尔·威尔逊选取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最相关的话题“女主角”为切入点，清晰再现了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动态的双重联系，揭示了维多利亚人如何充分且恰当地使用“奥斯丁”以及当代“奥斯丁热”的历史根源所在。这是奥斯丁接受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再次提醒当代人“奥斯丁”所蕴含的多面性、丰富性，对当今的奥斯丁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简·奥斯丁 女主角 “奥斯丁热” 奥斯丁接受研究 维多利亚人

2017年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逝世两百周年之际，美国学者谢丽尔·威尔逊（Cheryl A. Wilson）出版了专著《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Jane Austen and the Victorian Heroine*, 2017）。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著述是二十、二十一世纪奥斯丁接受研究的“前传”，填补了奥斯丁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影响与接受研究的重要缺口。谢丽尔的研究预设正是：当代人看待奥斯丁的视角可以在维多利亚人对奥斯丁作品的阐释以及对奥斯丁形象的建构中找到根源，而只有认清根源，才能更好地审视、理解奥斯丁如今在当代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存在，而且，维多利亚人对“奥斯丁”的多重使用或也可对当代人有所启发。

奥斯丁的文学遗产、文本与当代读者之间的关系、奥斯丁在当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是当代奥斯丁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谢丽尔的著述也是这一研究热潮的产物。这得益于“奥斯丁热”（Austenmania）的推动。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英国广播公司不断改编奥斯丁的小说，制作成影视剧向大众推介，“简迷”队伍迅速壮大，奥斯丁成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头牌文化偶像。这从各式各样奥斯丁指南的出版即可窥见一斑。2000年至今，几乎年年都有“简·奥斯丁指南”问世，有些年份甚至创下几乎每

两个月一本的纪录，指南覆及两性婚恋、日常仪态、人际交往、文学旅游等话题。^① 据统计，2017年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产生的经济盈利逾两千万英镑。^② “奥斯丁热”不见降温，这带动了奥斯丁与现代读者、现代社会的相关性话题研究，学者们将奥斯丁其人其作放入当代语境中，结合现代技术、全球化、大众传媒问题进行探讨。谢丽尔的著述并不探究奥斯丁在当代的影响力，它把目光放在十九世纪，再现了维多利亚人如何使用奥斯丁的作品与生平来应对社会问题，同时又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某种趋势的生成，与当代的“奥斯丁热”建立了联系：始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普通读者对奥斯丁产生广泛兴趣，“奥斯丁热”自十九世纪末起逐渐成形，开始影响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奥斯丁的影响力不限于学术圈内的专业读者，她早已成为全球文化人物，在普通读者中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种语境下，“读者”因素在奥斯丁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奥斯丁的接受研究多聚焦于二十、二十一世纪，“接受”（reception）专题出现在奥斯丁研究的重要合著或专著中即是有力的证明。1997年，具有权威性的《剑桥文学指南：简·奥斯丁》（*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收录奥斯丁研究专家克劳迪娅·约翰逊的《简·奥斯丁崇拜与文化》（“Jane Austen Cults and Cultures”）一文，可算是奥斯丁接受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对奥斯丁的接受、奥斯丁所代表的文化、如何使用奥斯丁及其成就的研究。^③ 这些学术探索

① 这里试着罗列一部分奥斯丁指南读本：*Jane Austen's England: A Walking Guide*（2018）；*Dear Jane: Wise Counsel from Ms. Austen and Friends*（2017）；*Jane Austen's Guide to Good Relationships*（2016）；*The Jane Austen Rules: A Classic Guide to Modern Love*（2014）；*Jane Austen's Guide to Thrift*（2013），*Global Jane Austen: Pleasure, Passion and Possessiveness in the Jane Austen Community*（2013），*Mr. Darcy's Guide to Courtship*（2013）；*Jane Austen's Guide to Life: Thoughtful Lessons for the Modern Woman*（2012），*Miss Jane Austen's Guide to Modern Life's Dilemmas*（2012），*The Jane Austen Guide to Happily Ever After*（2012），*All Roads Lead to Austen: A Year-long Journey with Jane*（2012）；*The Jane Austen Handbook: Proper Life Skills from Regency England*（2011）；*The Jane Austen Companion to Life*（2010）；*A Year in High Heels: The Girl's Guide to Everything from Jane Austen to the A-list*（2008）；*Dear Jane Austen: A Heroine's Guide to Life and Love*（2007）；*Jane Austen's Guide to Good Manners: Compliments, Charades & Horrible Blunders*（2006），*Jane Austen in Bath: Walking Tours*（2006）；*Jane Austen's Guide to Dating*（2005）；*In the Steps of Jane Austen: Walking Tours of Austen's England*（2003）；*How to Study a Jane Austen Novel*（2000），等等。

② Gillian Dow, “Dear Aunt Jane: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the ‘Austen Industry’ ”,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5, Aug. 2018, <http://www.the-tls.co.uk/articles/private/dear-aunt-jane/>. [2018-09-15]

③ 2005年珍妮特·托德（Janet Todd）主编的《语境中的简·奥斯丁》收录了《简·奥斯丁崇拜》（“Cult of Jane Austen”）等文章，而2009年的《简·奥斯丁指南》（*A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直接辟出专栏“接受与再造”（“Reception and Reinvention”），收录奥斯丁接受史系列论文。此外，重要著述有迪德雷·林奇（Deidre Lynch）的《简迷：信徒与爱好者们》（*Janeites: Disciples and Devotees*, 2000），瑞吉儿·布朗斯汀（Rachel M. Brownstein）的《为什么是简奥斯丁？》（*Why Jane Austen?*, 2011），克劳迪娅·约翰逊（Claudia L. Johnson）的《简·奥斯丁的崇拜与文化》（*Jane Austen's Cults and Cultures*, 2012），朱丽叶特·威尔斯（Juliette Wells）的《每个人的“简”》（*Everybody's Jane: Austen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2012）以及凯蒂·哈尔西（Katie Halsey）的《简·奥斯丁与读者们》（*Jane Austen and Her Readers, 1786—1945*, 2012），等等。

对奥斯丁研究各有贡献。虽也以奥斯丁的读者、奥斯丁与时代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因关注的时代不同，谢丽尔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奥斯丁热”自维多利亚晚期才兴起，“普通读者”在谢丽尔书中的份量相应地也不如其在当代研究中的比重，谢丽尔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研究普通读者反应的难题。在探寻奥斯丁与普通读者的关系时，2012年威尔斯的《每个人的“简”》与哈尔西的《为什么是简·奥斯丁？》都留下了比较典型的遗憾：二者胜在汇集了奥斯丁的读者反应专题的大量研究素材，但都缺乏一个明晰的结构，缺乏更聚焦的分析，著述难免流于松散。清晰的结构、聚焦的分析却是谢丽尔一书的长处。它从有效的角度——“女主角”切入，成功勾勒出一幅相当清晰又重点突出的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紧密交织图景。

谢丽尔的著述虽有寻常的“女性”议题，虽也力求呈现奥斯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接受情况，却有别于众多的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或十九世纪）女作家女性观的比较研究^①，也有别于按时间顺序汇编的奥斯丁接受研究。谢丽尔不以奥斯丁的女性观为具体研究对象，而注重奥斯丁如何开风气之先，拓展“女主角”的刻画手法：她并不按照社会预期的理想模式对女主角进行角色设定，反而不顾社会期待着力探寻女性角色的潜力，她也不时时将女主角作为小说所有活动发生的中心，而将女主角设定为他人故事的观察者或同情者。奥斯丁的上述作为如何为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仿效，这是谢丽尔的关注点之一。谢丽尔的书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索瑟姆（B.C.Southam）编选的奥斯丁批评接受史权威版本《简·奥斯丁：批评的遗产研究》（*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的前两卷（覆及1811至1940年）。谢丽尔的论述突出维多利亚人与奥斯丁“动态”的互动关系，重在揭示维多利亚人如何“使用”这份文学遗产以及奥斯丁如何通过“影响”获得新生。她的取材不尽然是全新的，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知名男性批评家们对奥斯丁的评论被收录在索瑟姆选编的材料中，谢丽尔也有所采用，但在她的论述体系里，这些材料被重新整合，有效地服务于中心议题，在第二章协力阐明了奥斯丁在维多利亚时代阅读指南书中地位的由来。

谢丽尔以维多利亚时代虚构世界里的“女主角”为关键词串联整部著述的讨论，

^① 此类研究的典型著述有：Hazel Mews, *Frail Vessels: Woman's Role in Women's Novels from Fanny Burney to George Eliot* (The Athlone Press, 1969)；Patricia Beer, *Reader, I Married Him: A Study of the Women Characters of Jane Austen, Charlotte Brontë, Elizabeth Gaskell and George Eliot* (Macmillan, 1974)；Judith Newton, *Women, Power, and Subversion: Social Strategies in British Fiction, 1778—1860* (Methuen, 1985)；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magin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等。

富有洞见。“女性问题”是维多利亚社会重点关注的两大社会问题之一^①，其成为热点的原因之一是：受工业革命的推动，维多利亚社会经济迅猛发展，致使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从生产场所中退场，回归家庭生活，亟待重新界定自身的女性角色身份。而此时小说繁荣发展，成为维多利亚人表达关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参与社会文化探讨的重要方式。中产阶级女性是小说读者群的主要力量，是小说主要的主人公，更是这一时期女作家的主体力量。此时女性写作蓬勃发展，女作家们塑造虚构的女主角，充分表达关于女性角色的种种设想。维多利亚人关注小说的发展，关注文学、文学阅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巨大力量，因此，“女主角”身上承载着维多利亚人的殷切期望：期待其成为女性典范的代表，给予普通读者人生方向的引导。一言概之，之所以选择文学人物为研究对象，因它联结了评论家、作家、一般读者三大群体，早期文学评论、评论家重点关注它，作家看上它的易被改编，一般读者乐于接受它的引导。^②这三大群体也是谢丽尔笔下的“维多利亚人”的主要构成。

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是奥斯丁的生平与写作中与维多利亚人最为相关的话题，这是基于两个令人信服的事实：奥斯丁在小说创作中探讨“女主角”的构思，创造了有影响力的女主角形象或类型；奥斯丁是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文化话语中虚构的“女主角”。“女主角”因此与奥斯丁有着双重关联，谢丽尔巧妙利用这一点来阐明维多利亚人与奥斯丁的复杂关系。

其一，奥斯丁对小说发展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其叙事手法以及对女主角的塑造，在于她如何书写女性，这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重要批评家与作家的认可。谢丽尔在第三章选取女作家凯瑟琳·哈贝克（Catherine Hubback, 1818—1877）与艾米丽·伊登（Emily Eden, 1797—1869）在1860年以前的作品为例；在第四章以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 1828—1897）与夏洛特·杨格（Charlotte Yonge, 1823—1901）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创作为例，参照物是奥斯丁的《爱玛》。谢丽尔指出，《爱玛》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探讨“女主角”的观念以及这位女主角如何在小说中发挥角色作用，而读者又该如何看待评判这样一位不合社会规范的女主角。奥斯丁采用自由间接体为主的叙事手法，使读者既能观察外界对爱玛的看法又可进入爱玛的内心，而小说的叙述者只给出路标暗示，等待读者自己来阅读、判断、阐释。奥斯丁的手法使得故事之内的爱玛和故事之外的读者都受到教育、获得成长。奥利芬特的《玛伽利班克斯小

① 另一大社会问题是英国状况问题（“Condition of England Question”）。

② See Cheryl A. Wilson, *Jane Austen and the Victorian Heroin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姐》(*Miss Marjoribanks, 1866*)与杨格的《一家之中的聪明女人》(*The Clever Woman of the Family, 1865*)从人物塑造、叙事手法、故事情节方面都效仿《爱玛》，尝试培育作者、女主角、读者三者的关系。谢丽尔长于从故纸堆里寻到详实可靠的证据，后辅之以逻辑清晰的论述。她从奥利芬特与杨格的书信、评论文以及小说中找到可信依据，表明两位作家对于自身创作所追随的传统有着自觉意识。在具体创作中，两位女作家既借效仿奥斯丁以对抗“银叉小说”或当时兴盛的惊悚小说的写作模式，又揭示当时左右女主角成形的各种力量，揭示在六十年代成为女主角之难、刻画聪颖的女主角之难，因为她虽僭越社会习俗，却又须适应当时文学市场的需求。谢丽尔认为：女作家们使“爱玛”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了新生，但同时也用“爱玛”服务于自身的需要，借“爱玛”与维多利亚时代对话、揭露时代的局限，她们既发扬又拓展了奥斯丁所树立的女性写作传统。

其二，奥斯丁与“女主角”的“纠缠”缘起还在于，奥斯丁受到关注的不仅是她的作品，更有她的生平与家庭，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奥斯丁开始成为维多利亚社会文化话语中的女主角/女英雄(heroine)。这与奥斯丁传记的出版、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建构国民身份的诉求密不可分。谢丽尔在第六章以传记、评论文、小说等为线索，追溯奥斯丁成为“英格兰的简”的过程。她重点讨论的传记是1870年奥斯丁的侄子奥斯丁-李(J.E.Austen-Leigh)发表的《简·奥斯丁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这是当时奥斯丁传记的权威版本。此传记与之前探讨奥斯丁作品的诸多评论文一同塑造了“简姑妈”形象，把奥斯丁与她的女主角们一起拉进读者的想象世界里。《简·奥斯丁回忆录》催生出“简姑妈”，奥斯丁被“驯化”为业余作家，这些并不是新知，但谢丽尔取用的不是通常之意，而是回忆录所构建的奥斯丁与英国性(Englishness)之间的关联。谢丽尔分析的重点在于《回忆录》如何反复强调奥斯丁的地域感，地域在奥斯丁创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强调奥斯丁的成长、创作与英格兰地域的关系，凸显奥斯丁的家庭性与英国性特征，将奥斯丁再现为家居型的英国女英雄。追随此传记关注奥斯丁的地域感的，还有布雷伯恩勋爵(Lord Brabourne)1884年出版的两卷本《奥斯丁书信集》(*Letters of Jane Austen*)，米德福小姐的小说《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 1824*)以及康丝坦斯·希尔与艾伦·希尔的《简·奥斯丁：她的家园与朋友》(*Jane Austen: Her Homes and Friends, 1902*)等。这些文本充盈着对奥斯丁笔下英国乡村风景与社区的眷念之情，唤起读者对逝去的英国乡村田园世界的怀念，加固了奥斯丁的本土化形象，同时还营造了由奥斯丁的读者知音所组成的社区(*Jane: 188*)。谢丽尔指出了本质：奥斯丁的英国性具有本土色彩，

以刻画普通人物与日常生活、乡村的社区生活、人际关系为特征。维多利亚人将奥斯丁奉为英国性的象征与捍卫者，代表了大英帝国正在消失的旧有社会秩序、旧有地域风貌。在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急于构建国民身份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奥斯丁的英国性被用作构建大英帝国国民身份的一个基本要素。

但是，谢丽尔还注意到了硬币的另一面：维多利亚人虽推举奥斯丁为英国性的象征，但他们对奥斯丁的认识却不是单面的、不加批判的（Jane: 167）。他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检视奥斯丁的英国性。谢丽尔的举例之一是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的《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 1854—1855）与《傲慢与偏见》的对话。她认为，盖斯凯尔试图刻画正处在变化中的英国地域风貌（城市）以及女主角在此中扮演的角色，公开探讨《傲慢与偏见》中北方与南方之间隐秘的矛盾，这有力地拓展了奥斯丁小说的主题，同时也重新检视《傲慢与偏见》，质疑了视奥斯丁为理想化淳朴英格兰的记录者的片面化观点。奥斯丁的英格兰存在很多复杂问题，持续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性、风景、乡绅观念，而其中的地域偏见问题，最终是通过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和解得以化解的。盖斯凯尔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奥斯丁的女主角带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但使得她在英格兰北部找到幸福。谢丽尔认为，这一情节设计提醒读者，《傲慢与偏见》所设想的英格兰南方与北方地域间的和解在四十年后的英国可能已不再必要，因为此时英国已成为日益全球化、工业化的国度，北方与南方也各有引以为豪的优势。因此，奥斯丁此时不仅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国民女英雄而存在，她的作品还引发了维多利亚作家的灵感，被用来探讨本土与全球，家庭与国家，理想化的过去与现实的现状间的复杂关系（Jane: 200）。总之，谢丽尔借“女主角/女英雄”的纽带，尽现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谢丽尔借“女主角”的视角，借助详实的一手材料、引证以及有条理的分析，试图在维多利亚人与当代人对“奥斯丁”的使用上建立某种连续性。她在前言强调，她的著作再现了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的复杂关系，这不仅关乎奥斯丁，也关乎维多利亚人。从全篇的分析看，“维多利亚人”一直占据谢丽尔提笔落笔间的所思所想。谢丽尔的研究对象是维多利亚时代，彼时奥斯丁尚未沦为美国大作家亨利·詹姆斯在1905年所批判的书商、杂志社为盈利而简化歪曲的“每个人的亲爱的‘简’”^①。彼此也尚未出现令奥斯丁研究者们头疼的现象：在奥斯丁被普及、商业化的时候，她被“错误的人以错误的方式热爱着，这些人明显不能评价她的真正价值，无法识别她真正的

^① Henry James, "The Lesson of Balzac", in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870-1940*, ed. B.C. South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30.

优点”^①。但是，谢丽尔的眼界、视野并不局限于维多利亚时代。她时常在奥斯丁的当代接受的语境下探讨维多利亚人如何使用“奥斯丁”，时常穿梭于奥斯丁的当代接受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接受情况之间，力求阐明问题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谢丽尔的研究虽尚未触及现代学者所面临的奥斯丁的普及问题，但却带着当代奥斯丁研究的问题意识去看待维多利亚人与奥斯丁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谢丽尔对维多利亚人在把握、应对社会问题时的审慎态度尤为关注。她似是带着当代学者对当代奥斯丁现象的“焦虑”去维多利亚时代寻求答案的，这尤其体现在与大众文化有关的第二、五、六章中。在第二章《阅读实践——以奥斯丁为向导》中，谢丽尔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严肃阅读的倡导及奥斯丁在各式阅读指南中扮演的主角角色。读者若对当代“奥斯丁热”有些了解，读到这一章时脑海里不免会映现当代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类“奥斯丁指南”。这种联想也是不无来由的。谢丽尔告诉我们，在各种阅读指南中，奥斯丁凭其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及严肃的道德观受到推崇，被奉为严肃文学的代表，与司各特一同被推举为抵御十九世纪下半叶通俗小说（惊悚小说）的侵蚀的良方^②。此时的阅读指南还传达了这样的担忧：惊悚小说造就的快餐式阅读习惯会破坏读者的文学品味、文学感悟鉴赏力，使其难以消化奥斯丁的作品。谢丽尔认为维多利亚人对阅读观念的传播及阅读习惯的养成十分重视，这是出于维多利亚社会发展的需要。她注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阅读指南充满着爱国主义的修辞，将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责任紧密联系，声称熟悉国家文化遗产是公民的责任，这是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社会充当阅读指南功能的行为指南书、教育或宗教小册子里所没有的。我们也不难注意到，这也是当代奥斯丁指南中所缺乏的言辞。联系当代“奥斯丁热”，重新审视谢丽尔的论断，我们不免会想到她是否有所针对。或许，她亦担忧“奥斯丁”在当代种种文化商业行为中“沦陷”。当代新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浅阅读正在侵蚀传统深度阅读、严肃阅读的习惯。曾经被奉为严肃文学代表的奥斯丁不再束之高阁，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读者的特权，她的作品被转化为快餐式的指南，推广于市井，服务于普通读者，这种方式在为普通读者提供便利的同时，是否也在遮蔽奥斯丁小说的深刻道德关怀，损坏读者对奥斯丁的文学鉴赏力，损害他们严肃阅读的能力？

^① Claudia L. Johnson, "Austen Cults and Cultur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eds., 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2.

^②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奥斯丁推举为开启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第一人，依凭的正是她的严肃深刻的道德关怀（see F.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7）。

谢丽尔所再现的维多利亚时代情境，为当代人思考奥斯丁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奥斯丁在当代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大众文化的推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大众文化同时兼具创造与毁损的能力。在大众文化对奥斯丁的“使用”问题上，谢丽尔似有所保留。她在庞杂的一手历史资料中仔细爬梳，反复求证，揭示了维多利亚人如何充分但又审慎地使用“奥斯丁”：尽管《简·奥斯丁回忆录》问世后奥斯丁的名声见长，但维多利亚人始终小心地控制着对她的使用，控制着她的影响，谨慎地选择他们为自己的社会留下的声音与遗产（Jane: 205—206）。谢丽尔的分析再现了一种现象：在维多利亚人趋于简化“奥斯丁”的时候，总会适时出现另一种倾向，对之加以矫正。在奥斯丁日渐成为文化符号，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时，维多利亚人并未简简单单地接受这份文化遗产。谢丽尔认为，对维多利亚人而言，奥斯丁与“女主角”之间存在着很复杂的关系（Jane: 205），因此他们谨慎对待。但是，到了当代，“奥斯丁热”持续升温，奥斯丁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各种生活指南读本、各种改编续写的文学文本层出不穷，“奥斯丁”的文化资本难逃被误用或过度使用的命运。

在被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大众手中时，奥斯丁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单面，被简化为爱情剧的女主角、自助文学的人生导师。这种“简化”行为抹煞了奥斯丁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有如奥斯丁研究者达成的共识，正是这份“丰富性”赋予了奥斯丁恒久的生命力，使得她能够跨越两百多年的历史与我们对话。事实上，在《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中，谢丽尔的聚焦分析让我们清楚看到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生成，也正是基于奥斯丁本身具有的丰富性。谢丽尔在著述的结尾处写道，“对于当代的奥斯丁读者与作家而言，维多利亚人使用简·奥斯丁的方式成为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持续影响着我们去辨识新方法，理解、赏识、认识我们自己的‘简’”（Jane: 206）。写在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之际，谢丽尔的著述给予了当代人适时而恰当的提醒。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永怡